



新世纪
文学观察

主编：续小强

当代批评 的本土 审视话语

牛学智◎著

我坚持文学批评的属性，它不是拼正确，而是拼价值冲击程度；不是拼标准，而是拼理念对人性的影响力；不是拼模式，而是拼冲出既有模式的思想能力——达到这一层，另一种新话语方式就要产生了。

当代批评 的本土话语 审视

牛学智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 / 牛学智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 1

(新世纪文学观察丛书 / 续小强主编)

ISBN 978-7-5378-4012-5

I. ①当… II. ①牛…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137号

书 名: 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

著 者: 牛学智

责任编辑: 曹江涛

装帧设计: 张永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 (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3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印 张: 20.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012-5

定 价: 39.00元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我们进入新世纪已经十多个年头了。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新世纪中国文学酝酿并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若干新的思想艺术特征。应该说，把新世纪文学视为中国当代文学演进发展的新阶段，是可以成立的。

约略八十年前，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了及时回顾总结这十年的文学发展，赵家璧先生延请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学名宿，编选推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年—1927年）。它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后来者的启示作用也日益突显。

尽管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我们组织出版这一套“新世纪文学观察”丛书的根本要旨却与当年赵家璧先生约略相同，我们亦希望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同步，分阶段地对新世纪文学做认真的捡拾、回顾与总结。本丛书依照文学文体的分类，对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分析与研究；所延请的作者，无论年长年幼，均是长期以来对相关文体做跟踪研究的学者或批评家。故而，这一套丛书的出版，是新世纪文学创作成就的展示，同时也是新世纪文学批评与研究实绩的见证。

我们期望，本丛书的推出，既可以推动行进中的新世纪文学创作向更纵深

2 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成为作家和读者了解新世纪文学的一扇窗口，更可为后来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从某种角度充分说明，行进中的新世纪文学正处于一个极好的发展阶段。未来的日子里，传统的文学样式当会有更好的发展，如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亦会呈现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同步，这一套丛书也将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第一辑之后，一定会有不断的跟进。举凡有学术创建、以新世纪文学为考察研究对象的书稿，我们就会将其纳入进来。一方面，我们要为新世纪文学的发展鼓与呼；另一方面，对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关注，将是北岳人恒久的出版责任和使命。

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续小强

对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错位的“审视”

在年轻的批评家中，牛学智逐渐表现出独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直觉，并显示了将理论直觉通过一种理性技艺进行清晰展开的写作能力。除了具体的文学批评外，牛学智的一个理论兴趣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这部关于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的著作并不仅是在他已经出版的几部著作之上再增加一部，学智学术道路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都踩在现实意识的根基和学术思想的基本脉络中。在此之前，他已经对当代批评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学案式研究，梳理出当代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一书中。“众神”是一个友好而戏仿性的修辞，通过对一系列理论批评家的个案研究，牛学智逐渐在一种批判性分析中发现了“众神们”的误区与盲视，《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则体现出一种更接近真实批评意图的理论眼光。

在当代理论与批评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审视”一书集中处理了这样几个逻辑上相互联系的核心问题：对六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思潮的主体性反思、新世纪文学批评话语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晚近典型话语方式的价值审视和文体化本土批评话语机制建构等四个相互影响、前后制约的命题”。

通过对批评家主体性的反思，牛学智敏锐地指出其问题的症结在于：“本土话语因受制于大量涌进来的西方各种主义，变得沉淀不足，因而话语演练草

率而匆忙”，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批评界急于与西方理论同步时，主体性问题的反思已半途而废。在文学、批评与批评家尚未摆脱工具论的影响和意识形态支配时，皈依后现代的非主体性事实上带来了观念史与制度史的错位。这种错位包括一系列的批评观念与社会语境之间的错位，牛学智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状况：“1980年代‘新启蒙’与1990年代‘底层’之间价值观的断裂与错位，导致启蒙话语变成了专业主义；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中国经验’逐渐取代了现代性话语，致使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术化追求压抑了批评本有的问题意识。”

2

我愿意就此多说几句。无论是1980年代的“启蒙”还是“现代性”思潮，在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并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进程或稍稍完备一点的制度设计，否则到了“经济起飞”的1990年代，文学批评领域也不会重现“底层”话语。诡异的是大多情形下的“底层”话语却又转向批评“启蒙”思想和反现代思想，其间的理论资源和社会语境之间的错位产生了诸多混乱，甚至变成了一种观念的狂欢。事实上，如果没有观念在历史事件和人类社会行为中的展露，如果观念没有经过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实践，没有体制的和制度化的变革实践，如果没有引起或伴随着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制度实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影响到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的观念持久地起着规范性的和批判性的作用，文化或文学上的观念就缺乏自身的历史真实性与经验内涵。

1970年代末至整个1980年代重新呈现出一抹希望的社会理念在纯粹的暴力时刻化为幽灵，之后，社会的重新组织过度依赖经济利益的黏合。经济强化了一切，然而真诚的社会理念，却没有得到同步强化，不公与不满一直挑战着和平与正义。

恰恰就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审视”一书通过对近年国家社科课题立项的当代文学研究选题、重要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的导向和对批评话语方式的分析，进一步深入批判了文学批评在价值趋向、文化理念和话语方式等方面存在的普遍理论问题。虽然在今天的理论语境下读者不见得会同意学智所说的文学批评应回到“人性论”这一立场，但无疑我们会认同他的根本判断，即文学批评应“回到当日精神事件的紧迫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的考察之中。

“审视”一书在对晚近几种典型批评话语方式及其价值趋向进行了具体考察之后，牛学智提出了一种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批评：

……主体性话语经西方转译到中国语境后，途经中国“反现代性主体性”解构，到“民俗主体”取代并形成“文化话语”而致于主体性话语消散的过程。正是在主体性话语消散的语境，民间民俗文化话语与国家话语达成了共识，进而最终被国家话语取代，文学上普遍的认同危机、归属危机的探讨，在理论上被搁浅，理论批评者处于两头失语的境地（外来理论话语很难根植于本土，既有本土话语又被中间架空）；在此理论现实，本著研究认为，只有正视“欲望主体”并通过合理引导，从欲望主体本身生成意义生活；另外，从介入消费社会结构开始，纳入“新穷人”视野，文学批评对消费主义、身体欲望泛滥的身体主义，才能保有有效性言说的思想能量。因此，在当今社会现实，建构主体性话语、民间民俗文化话语、身体性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动态言说机制和社会学支点，是确保文学批评重返时代思想前沿，介入并引领人们价值生活的前提。

牛学智的这一观察相当富于洞见，尤其是在小说批评领域，“民俗主体”替代了启蒙的个人“主体性”，“民俗话语”取代了主体性话语并与“国家话语”达成共识继而为后者所取代，确实道出了一个时期公开的秘密。在最后部分，经由对几种批评话语方式的分析，“审视”一书提出了它的诊断，文学批评之所以显得苍白乏力，缘于批评话语空洞的“泛价值论”和过于抽象的“本土传统文化论”。对此，牛学智提出的理论设想或纠正方式一是“文体化”或批评的文体意识的增进，一是不偏离我们的切身经验、不过度抽象的、包含着细致的文体意识的“价值书写”。他说：“只有文体化，细化文学批评的价值书写，本土文学现代性研究才能走向深入，对当今文学的言说才会更加可信，对本土价值观的论述才能形成自洽的话语系统，批评的自觉程度才能得到切实提高，批评自信才能落到实处。”就我对学智这一论述的理解而言，文体意识的增进意味着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批评家主体性的重新确立，价值书写的细化意味着对本土经验的深入勘察，这是批评话语本土化的两条殊途同归的路径。“文体化”要求与细化价值书写都是增进批评话语本土化的方式。在这里，牛学智

通过小说批评和诗歌批评的某些已经存在的实践，探讨了这一本土理论话语的生成以及批评的本土话语机制在写作实践中的应用与检验。

在当代批评话语与它的社会历史语境显得如此错位的时刻，在观念史与制度史如此分裂的情况下，牛学智的对当代批评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错位的“审视”是富于洞察力的，他所强调的批评的文体意识与价值书写也深具思想的创见性与预见性。在批评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极度错位的情形下，观念及其整个批评话语是无法在本土扎根的。本土化是观念、概念的重新语境化问题，是批评观念、概念与社会历史经验之间张力关系的建立。绕过本土令人焦虑、痛苦的社会文化状况根本无法使概念的空中旅行具有本土意义。在牛学智提出批评话语的本土化并进行了细致考察之后，或与之同时，“审视”一书既提供了当代批评现场的概观无疑也勘探了通向当代批评前沿问题的路径。或许，我们应该把这一“审视”视为当代批评所做的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

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 耿占春

大体说，集中精力研究文学批评，始于 2006 年。目前为止，历经八年的跟踪结果就是两本书：一本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系 2007 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项目，2012 年 3 月获得该项目后期出版资助，同年 6 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是对新时期至今我认为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家的个案研究；另一本是这个《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它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的“姊妹篇”。其一，在《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中，我对批评家说了不少“不”，我有义务在《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中接过那个“不”，陈述陈述我所谓的“是”；其二，我所谓的“不”，或者在“是”中对其他并未正面论述的批评文本、批评家隐含的“不”，因为“批评家个案研究”的体例，我并没有把那个独立课题展开，而是压缩了，暂时省略了，这个独立课题就是“批评的本土话语”问题——它只配专门的言说。“个案”，需要凝视批评家的思想理路、价值论述和观察文学创作的着眼点。所以，个案中我主要凝聚和三思的是，我的研究对象在他们各自的批评实践中，对一时整个人文现状的消化处理结果，最后才是凸显于文学批评中的审美问题、价值观问题和批评修辞问题，以及由此折射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特别是知识分子个体在启蒙现代性路子上的价值探索形象。这样的考虑，不可能不包括“我注六经”，但总的来说还是遵循“六经注我”的底线。

而“批评的本土话语”研究，作为写作者的我的主体性，非但不需要强行压

着，反而要更加发展，才能最终完成。当然，“发展”需要有个必要约束，否则，发展就成了发挥。发挥很可能会走向某种极端化，甚至某种神秘化、私密化的经验死胡同，那就不是文学批评的本土话语了。之所以到今天，最终从“个案”走到了“话语”，是因为经过七八年时间的集中阅读，我坚信，不管文学创作的差异大到什么程度、分化（类型化）到什么无法互相沟通的地步，对于价值书写的文学批评来说，它的终极关怀是使差异缩小，而不是制造差异。直接的一个理由是，无论哪个代际的作家、哪种主义倾向的文学观，只要对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处境，有个基本认知，而且把这个基本认知作为文学叙述的基本经验来源，理论上讲，无论选择何样的叙事，文学之于社会的性能都应该不会完全无法达成共识。这即是我为了避免对文学批评横加指责的泛价值论，特意按批评倾向性选择分解成各类话语，并通过各类话语的内在特点（根据文学创作类型而来），由类型上的“分”，再走向价值期许上的“合”的批评话语研究的构想。

既然如此，现在，有一些核心问题在这里必须有所交代。

即在批评的本土话语研究中，我如何发展我的主体性体验，又如何限制个人经验不至于衍化成唯个人才有的经验的问题。

第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的个人经验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信的？现在我供职于地方社科院，但在此前的十八年时间里，我辗转好几个地方，分别从事过中小学、中专学校、普通高校等不同类型的教育工作。往大里说，我从事各类学校教育工作的过程，正好是社会意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乃至消费社会的过程，作为社会意识的最敏感人口和文学的最大读者群，我体验了各种年龄段学生的反应。从“四大古典名著”、《平凡的世界》到《檀香刑》或《活着》《幻城》《哈利·波特》《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等，批评家的说辞是一种，普通读者的感受又是一种，对照不同读者反应的反应，得出的可能是第三种。对批评话语的审视，也许得从第三种开始。这是一个无需用旁征博引就能讲清楚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经验如果主要来源于基层社会（不是“底层”），那么，基层人群的反应及其我对他们反应的反应，就是一个基本的基层文学感知状态。凝聚绝大多数人群的无意识，我想，即便不是好的甚至扎眼的理论发现，但也绝对是有效的、

大体说，集中精力研究文学批评，始于2006年。目前为止，历经八年的跟踪结果就是两本书：一本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系2007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项目，2012年3月获得该项目后期出版资助，同年6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是对新时期至今我认为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家的个案研究；另一本是这个《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它是《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的“姊妹篇”。其一，在《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中，我对批评家说了不少“不”，我有义务在《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中接过那个“不”，陈述陈述我所谓的“是”；其二，我所谓的“不”，或者在“是”中对其他并未正面论述的批评文本、批评家隐含的“不”，因为“批评家个案研究”的体例，我并没有把那个独立课题展开，而是压缩了，暂时省略了，这个独立课题就是“批评的本土话语”问题——它只配专门的言说。“个案”，需要凝视批评家的思想理路、价值论述和观察文学创作的着眼点。所以，个案中我主要凝聚和三思的是，我的研究对象在他们各自的批评实践中，对一时整个人文现状的消化处理结果，最后才是凸显于文学批评中的审美问题、价值观问题和批评修辞问题，以及由此折射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特别是知识分子个体在启蒙现代性路上的价值探索形象。这样的考虑，不可能不包括“我注六经”，但总的来说还是遵循“六经注我”的底线。

而“批评的本土话语”研究，作为写作者的我的主体性，非但不需要强行压

着，反而要更加发展，才能最终完成。当然，“发展”需要有个必要约束，否则，发展就成了发挥。发挥很可能会走向某种极端化，甚至某种神秘化、私密化的经验死胡同，那就不是文学批评的本土话语了。之所以到今天，最终从“个案”走到了“话语”，是因为经过七八年时间的集中阅读，我坚信，不管文学创作的差异大到什么程度、分化（类型化）到什么无法互相沟通的地步，对于价值书写的文学批评来说，它的终极关怀是使差异缩小，而不是制造差异。直接的一个理由是，无论哪个代际的作家、哪种主义倾向的文学观，只要对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绝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处境，有个基本认知，而且把这个基本认知作为文学叙述的基本经验来源，理论上讲，无论选择何样的叙事，文学之于社会的性能都应该不会完全无法达成共识。这即是我为了避免对文学批评横加指责的泛价值论，特意按批评倾向性选择分解成各类话语，并通过各类话语的内在特点（根据文学创作类型而来），由类型上的“分”，再走向价值期许上的“合”的批评话语研究的构想。

既然如此，现在，有一些核心问题在这里必须有所交代。

即在批评的本土话语研究中，我如何发展我的主体性体验，又如何限制个人经验不至于衍化成唯个人才有的经验的问题。

第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的个人经验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信的？现在我供职于地方社科院，但在此前的十八年时间里，我辗转好几个地方，分别从事过中小学、中专学校、普通高校等不同类型的教育工作。往大里说，我从事各类学校教育工作的过程，正好是社会意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乃至消费社会的过程，作为社会意识的最敏感人口和文学的最大读者群，我体验了各种年龄段学生的反应。从“四大古典名著”、《平凡的世界》到《檀香刑》或《活着》《幻城》《哈利·波特》《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等，批评家的说辞是一种，普通读者的感受又是一种，对照不同读者反应的反应，得出的可能是第三种。对批评话语的审视，也许得从第三种开始。这是一个无需用旁征博引就能讲清楚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经验如果主要来源于基层社会（不是“底层”），那么，基层人群的反应及其我对他们反应的反应，就是一个基本的基层文学感知状态。凝聚绝大多数人群的无意识，我想，即便不是好的甚至扎眼的理论发现，但也绝对是有效的、

有活人气息的情怀。相反，只把文学及其研究它的批评视为学科，按照学科规定生产的文学及其批评也许可能永远会为其学科性保驾护航，但不见得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及其寄身其中的人群。如此例子在过去不少见，在当下更是加倍繁殖，有时甚至到了消解文学及其批评本身的程度。

第二个必须解释清楚的知识支援是，先信赖文学理论惯例，还是先信赖社会学的发现的问题。在《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一书的写作过程中，为了遴选出富有创见、对某段文学理论思潮或人文思潮沉淀比较好的批评家，我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了比该书所写多得多的批评家文本和中外文学理论批评论著，结果产生了一个突出感受。总结来说，就是批评意识、批评声音，普遍受制于既有文学理论惯例。作为体验对象，绝大多数批评文本要么是当代文学学科内的例行作业，是“当代”和“文学学科”这两个规定性内的言说；要么是某种不证自明的“纯文学”的繁衍增值，一般会把逻辑起点置于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是老庄或儒家那里，人性的问题于是成了向内自我修炼的个人道德素养问题，而不是社会政治问题。相比较已经有的社会学发现和哲学思想论述，文学批评对人文现状的反应既迟缓又滞后。这一点使我坚信，在既有文学理论惯例内部，无论中西转换还是古今转换，要把文学批评的镜头再往文学人口（还不包括非文学阅读人口，但人数一定远远超过中产者及其以上阶层人数总和的底层人群）推进半步也都十分困难了。这是现代性论述和社会学视域下的消费主义论述（反批评）成为这本书的一个理论支撑的重要原因。它们反过来支持了我的基层社会经验，我的基层社会体验同时也找到了文献意义上的理论依据。也即是说，我的个人基层社会经验、体验，正是在这里有了充分展开的理由，也正是因为展开，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收敛仅仅是个人性的那个私人经验——因为，共识总是在走出个人性的同时被检验为什么是个人性什么是公共性的。中国历史上，“集体性”及其连带而来的任何东西的确需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但是，在当下的今天，“我”字打头、“私”字打头的文学经验和理论批评，目前而言，恐怕还很难与一些社会学论述、哲学思想表达相匹配。王晓明先生在《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一文中也说过此等意思。他经过严密的现象分析后认为，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问题的讨论声中，无论网上网下，都鲜有“严肃文学”（指以莫言、王

安忆等为代表的文学)作家的声音——这一情况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去年依然如此;“严肃文学”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情节和故事中,也几乎没有被公众视为对世态人心的精彩呈现,而得到广泛摘引、借用和改写的。过去的“集体性”是什么,今天的“公共性”究竟指什么,我想这是无须费多少智力就能辨析清楚的。关键在于,当我们不约而同地认定讲述封闭的个体自身,仿佛更接近高悬于头颅之上的那个“文学性”时,文学之于社会现实的性能,包括文学性本身的能量,实际上早已消失在活人世界之外了。而我们的一些理论批评刊物仍乐此不疲地要求对文学进行审美,再审美,其实审美的不过是某个早该废弃的概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的所谓知识、经验和概念,难道不是我们反思的对象吗?基于这一点倒回去想问题,既然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结果如此之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借重一些新的社会学及哲学思想论述眼光、方法和视野,构建一种批评言说机制,或者再不行,凭借它们把论述文学的焦距调得再近一点,视角再深一点,囊括的非文学人口面再宽一点,不也是当务之急吗?

第三个必须说明的方法论是,有了我认为值得信赖的社会学发现和哲学思想论述后,对批评话语的审视,是否会把批评推向以往被否弃了的社会历史批评的问题。挑明了说,我最终要写这本书,其实根本的一个疑惑是,在我们这边来说,启蒙现代性本来就展开得不充分,再加上晚近这些年来剧烈的社会分化和不顾一切的经济增长、相当快速的城市化等等,导致经济主义机制成了实际上的主导性价值趋向。然而不幸的是,文学及其批评正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几乎是大面积地撤向了“自我”和所谓的“内在性”。一般性地看,“自我”“内在性”及其附带而来的审美价值观,似乎正逢其时。因为,异常的焦虑、孤独、不确定、没有安全感、没有意义感和郁闷、纠结等所谓“城市病”,难道可以通过自我叙述、内在性叙事得到缓释吗?但问题是,在我们这边,总是特殊性成分居多。视野如果仅仅是自我的和那种自在的民间信仰层面的内在性,深一层追问,所有的文学写作的确没有存在的特殊性了。因为比之其他形式的表达,文学除了母本的作用,实在很难找到它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粗浅思考,对于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我心目中理想的结果当然是,希望通过对哲学思想、社会学的借重,最终生成各类批评路向的价值言说机制。因为历史的

原因，我也很警惕回到我们有过的那种所谓的“社会历史批评”。但我想，因噎废食、投鼠忌器恐怕同样是可怕的。所以，简而言之，先从现有社会机制和社会分化中捋出一条本来该文学批评严正关注，但不知什么原因却被有意无意抛之脑后的线索，然后把聚焦点放到各路话语的纹理分析上，再返回到共识性的价值可能上来，实现批评话语选择虽“分”，但理论表述进行到深处、较彻底之时，必然能从基本价值共识上找到交点的真正多元化局面。既确保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并为这多样化取向空间的不断拓展尽理论批评的职责，又能葆有理论批评自身丰沛生命力，不至于因道德感的褪色而无根飘零，或者因良知坐标安放错位而标准混乱。乐观一点看，如此论述方法，不是到当下为止，而是从当下开始的立论，缩短了批评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或者可谓之为正面介入性研究，也自然是关于批评话语及其价值言说机制生成的建构了。

最后一点，必须申明一种立场：就是警惕文学批评的“反知识性”写作倾向。目前，我还很难弄清楚一些指责批评的人对文学批评的深入程度，但一个直感是，这些指责文章基本浮在水面上，是对臆想的“学院派”这个代名词的反复嘲弄。

“学院派”批评的毛病当然是存在的。概括说：1. 当前学院量化考核机制之下的例行作业，大部分可能还是教案的模式——因为教学中，谈一部作品总喜欢拉出一大堆相关作品的名单，称之为文学史钩沉。常识性旧知识用在不合适的地方，就是文章的赘疣。2. 教授先生们总喜欢搬运新鲜名词，不必要的命名取代了对活生生现实的直接判断，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自然不喜欢读。3. 硕博毕业生需要在CSSCI刊物发表2至3篇论文，而这些刊物大多数又在董事单位化和栏目主持人化，毕业生恐怕只能先放下自己的判断来投合那种单一的学术口味，才能进入所谓学术规范，强行说一些自己陌生的体验，文章就不可能写得诚挚感人。4. 西方理论资源的确是我们征用的主要来源，然而，限制自我经验的过度发挥和作为自我经验的佐证，肯定不是一回事。经验的“去本土化”主要是后者，因为后者的本意仍然是无条件地书写自我和无所不在的内在性叙述。这意味着，征用什么理论不会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只能是越走越私密、越走越神秘、玄乎的个人封闭性经验。现在，这些普遍的毛病当然仍然存在，只是在这毛病之下，或者在这“象征符号”的掩盖下已经开始的另一批评趋势则不能不引起注意，便是以同样匹配

与创作的“自我”为轴心旋转着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所谓艺术欣赏。他们宣称不谈现代性，不谈社会现实，只为文学写作的技术负责。那么，这里面对“好”与“坏”的判断，及对之的表达，即便是以经典技术为参照，对于分化剧烈的社会和巨变的世态人心来说，还会有更强烈的批判针对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没有哪个经典细节，也没有哪个个人的艺术直觉，是为今天的中国现实而准备的。因此，所有有此自信的批评家，虽不无用武之地，也不会因艺术观的周期性调整而过时——至少不会在作为必修项目的现当代文学课上和学分制的考试制度表上被随随便便废除。但必修课的存活，并不等于当代文学的生命力本身。毕竟，走出高校的四堵墙，才是检验如此言说行或不行的真正战场。

6 这样说，我并非申明我的写作就一定遵循什么了不起的知识生产逻辑，我只是一直在给自己敲响一个警钟：任何有效的言说，都并不是空穴来风，亦不是神秘才华驱使，更不是反复编织预言家的故事，而是建立在可靠的思想基础上的“接着说”，或皓首穷经之后的“我来说”。以我拙劣的才具，只能勉强维持“接着说”而已。换句话说，万一缺乏发现真相的眼光，退一步想，“接着说”在最低程度，总还可以确保论说的公信度。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首要任务本来是对一堆凌乱话语构件的观照，“述”与“评”虽然不是新方法，但这老办法之于既“转化”域外经验，又“消化处理”本土现实而言，仍不失为实证分析方法——因为它依靠的主要语境是社会潮汐和世态人心，以及其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因素。简单说，是“个体”视角和“个体化”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领域。举个例子，当我们以“个体”为本位，用“个体化”理论来打量底层社会时，底层者个体身上的毛病可能会成为关注的重点，“哀其不幸”“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等等，会立刻在某个敏感的神经末梢汇集，最终诱发理论迫使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底层个体内部；然而，当这样的个体慢慢聚集成一个连片，犹如火车站候车厅而不是机场的登机口，注视那些扛着铺盖卷、拖儿带女风风火火来不及收拾眼屎的返乡者、远行者大军时，这些人群所标志的恐怕该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非个体道德伦理修养问题吧！我所以在发展我的主体性时也要时时刻刻警惕过度发挥，原因在于，一己的个人经验并不能解释清楚这样的社会学问题，它虽属于文学批评的外部研究，但一定是深刻影响内部研究的外部内容。故选择把跨学科的思想转化作